

公众不应是成本监审过程的旁观者

社会热点

□志灵

去年2月至今年2月,广州市价格成本调查队对广州市自来水公司2008年至2010年度情况实施了供水成本监审。在这份“监审清单”中,一方水被企业多报成本0.348元,比

真实成本“虚高”了17.26%。连政府财政投入、企业吃喝开销、管网漏损等费用,都被算进企业供水成本中。

不难想象,如果没有成本监审制度,按照广州市每年近12亿方的供水量,广州市自来水公司一年将“凭空”从市民手中拿出超过4亿元的收入。成本监审稍微一动真格,企业自报成本的虚高问题就浮出水面,成为“公开的秘密”。

对于基础性公共产品,由于其原本没法由市场做好,因此它是一种必

然的垄断,不可能通过所谓“引入竞争打破垄断”的方式来让价格趋于合理,只能是寄希望于通过健全的成本监审制度,像广州这次对供水成本进行“较真式监审”,才能防止垄断企业将不合理成本转嫁给公众。

现在的问题是,这样的“较真式监审”,对于公众来说可遇不可求,具有很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。纵向比较,虽然广州市价格成本调查队在自来水成本监审上表现得很抢眼,但在出租车调价听证时发布的《广州市出

租汽车运营成本监审报告》则让人大跌眼镜。

横向比较也会发现广州市自来水成本监审并没有产生示范效应。据新华社记者在全国多地采访的情况,在不少地方甚至要见到“成本监审清单”实属不易。事实上,公众对于公共产品的成本监审没有任何话语权和参与权,只能作为旁观者被动地接受,其所面对的成本监审要么秘而不宣,要么即便公开也是“过场式成本监审”,而遇到“较真式成本监审”简

直可说是幸运之极。

应该说,由于公众对于公共产品的消费需求是绝对刚性的,他们是成本虚高最大的受害者,对于挤干成本中的水分最有动力和热情。当务之急是,如何让公众更为全面、充分地参与到公共产品成本监审的全过程,对成本监审形成一种持续的压力,让每一次成本监审都动真格,成为“有牙的老虎”。否则,每一次走过场的成本监审,都会成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垄断企业屡试不爽的虚高成本转嫁手段。

画中有话

□文图/小强 图/春鸣

34岁的何大大在抢了一女孩的手机后,非但不撤离,还陪着女孩走了一段路,边走边安慰女孩道:“你也别太伤心,我也是被逼无奈的,我的身份证丢了,又找不到工作,这次实在是对不起你了。”近日,何大大因涉嫌抢劫被南京建邺区检察院批捕。

《复活》里,聂赫留朵夫公爵糟蹋了乡下妹子玛丝洛娃,若干年后发现玛丝洛娃竟已堕落成妓女,于是开始了忏悔赎罪之旅,向她求婚、为她申冤、陪她流放……干坏事的人,或许都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聂赫留朵夫情结,虽不能像公爵那样通过虔诚的付出来赎罪,在适当的时候,也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深情表白。比如,何大大的即时道歉,又比如,许多贪官在面对乡村小学孩子饭盒里缺盐少油的饭菜,也会热泪盈眶。

想通过几句对不起就平衡自己的罪恶,这虚假的道德秀,近乎一种精神娱乐,和“你伤害了我,还一笑而过”差不多。

抢完手机后还道歉,怎样的“聂赫留朵夫情结”



北京有一半汽车在天上飞吗

□苏文洋

市交通委日前集中答复关于停车管理的市人大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时,公布一组数据:截至今年3月,全市共有登记机动车504万辆,而全市停车位数量仅有248.4万个。

这组数据有什么问题吗?一个问题是没有停车位,还是不管有没有停车位,事实上都在地上停着。另一个问题是,假定全市停车位数量仅有248.4万个,北京的停车位缺口还要更大一些,因为北京还有相当数量挂外牌牌照的机动车,事实上也长期在北京使用和停泊。特别是实行摇号买车后,一些北京居民采取变通的办法,在河北、天津等地买车上牌照。

市交通委这里犯了一个概念不清的毛病。用结婚登记打比方,就是有500多万对夫妻,到民政局登记的只有240多万,剩下一多半是事实婚姻。反正你说到天亮,也不会让人相信北京有250多万辆汽车没有停车位,都在天上飞着呢。我猜想,市交通委所说北京只有248.4万个停车位,指的是收费停车场,包括马路上划的停车位。由此可见,人民群众的力量有多大,办法有多少,居然就把没有停车位的250多万辆车停下了,总体上看,也还停得不错。

北京乃至整个中国,都没有预料到汽车进入家庭如此迅速,汽车工业发展如此迅速,只好走一条先解决“吃”,再解决“拉”的汽车发展道路。现在,“吃”的问题容易解决,居民有了汽车消费的意愿。“拉”的问题一直滞后,有历史造成的原因,也有管理能力太低的原因。“又让马儿快快跑,又让马儿不吃草”是不行的,又让人们买汽车,又不大力发展停车位也是不行的。买汽车对拉动内需、带动经济的好处我们都享受到了,又不想承担停放汽车的责任,岂不是“只管起飞,不管降落”?

解决汽车停车位问题,一定要多用积极的措施,少用消极的办法。什么是积极的措施?我听说法国人在这方面比较积极,能够利用的空闲道路尽量安排停车,挖掘一切可能停车的潜力。法国人还有一个办法,停车一辆换一辆,前后顶得很紧,每辆车都不拉手刹,谁的车要出来,向前顶一辆,向后顶一辆,车就开出来了。因此,法国人开好车的少,而且很多车前后都被顶得四一块。人家似乎也不为此打架,挺和谐的。法国很少收停车费,更没有为此出人命。消极的办法就是学习香港。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平介绍,香港平均每个停车位的拍卖价格在150万至350万港币左右,香港政府就是通过拍卖停车位的方式有效控制了机动车数量。香港这套纯粹钱说了算的方式,大概是当年港英当局遗留下来的,照搬照抄到北京恐怕行不通。何况,香港是个弹丸之地,寸土寸金,和北京没法比。而香港地铁“八达通”也确实世界一流,北京又和香港没法比。倒是东京只有北京面积的1/8,汽车比北京还多,解决停车位的经验可以借鉴。

百姓观点

折扣839万,“领导亲戚”真值钱

□陈强

深圳一李姓女子自称是某书记的亲戚,从开发商手中拿得批条,可以7.8折购买两套大南山紫园别墅,低于市场价839万元。开发商称向某书记汇报此事后发现该女子并非领导亲戚,不同意按折扣价卖房,女子指其不讲信用。经记者查询,此书记现为省管正厅级官员。

打出一个“领导亲戚”招牌,就能得到839万元的天价折扣,“领导

亲戚”为何这么值钱?

尽管这项天价折扣大奉送,因为发现并非“领导亲戚”这一“真相”而没有送出去,但是,不妨假设一下,假如这一李姓女子真是“领导亲戚”,是不是轻而易举就得到这839万?

事实上,“领导亲戚”值钱已经不乏先例,此前,巨骗洪明如冒充中央领导亲戚诈骗800多万,骗子邹全安冒充中央领导亲戚诈骗485万,女子霍某冒充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领导的亲戚诈骗1400万元。

“领导亲戚”金字招牌一打出,就有财源滚滚来,这就不由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,为什么“领导亲戚”这么值钱?原因还在于“领导”身上,开发商甘愿奉送839万大礼,看中的无非是“领导”手中的权,企图用839万换取更大的利益,说白了就是钱权交易。

“领导亲戚”之所以吃香,还在于这是一个潜规则,一些比较“含蓄”、比较“爱面子”的“领导”,不愿意直接与商人进行钱权交易,就把所谓的“亲戚”推向了前台,让“亲

戚”为自己收受贿赂冲锋陷阵,自己躲在幕后遥控指挥,一旦东窗事发,可以有回旋的余地,甚至可以推个一干二净,全身而退。事实上,有不少贪官就是通过自己的老婆、孩子、情妇甚至是小舅子小姨子这些“亲戚”受贿索贿的。

其实,839万元折扣大礼何尝不是一封举报信?一个冒牌的“领导亲戚”也能享受如此“大礼”,货真价实的“领导亲戚”有没有受过类似的“大礼”?相关部门不妨查一查,看一看“领导亲戚”到底有多值钱。

拿出实际行动来,防狼比发微博有力

□张丽

6月20日晚上,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在其官博上发布消息,提醒女性穿着太暴露可能导致色狼骚扰。全文为:“乘坐地铁,穿成这样,不被骚扰,才怪。地铁狼较多,打不胜打,人狼大战,姑娘,请自重啊!”博文配有一名身着黑色丝纱连衣裙妙龄女子的背面照,其内衣清晰可见。24日上午,两名年轻女子在上海地铁二号线对此事举牌抗议。

不能不说,上海地铁方面说话太过随意。地铁方面的本意并不坏,无非是想提醒女性“不立危

墙”,毕竟没有哪个姑娘不痛恨性骚扰的。但采取平等、理性的表达就那么容易吗?无论有意还是无意,自己先站上道德台阶,居高临下地睥睨女同胞,还隐隐在字里行间流露出“性骚扰源自女性不自重”的价值判断,也就难怪有人愤怒了。过于暴露的着装的确是性骚扰的一个诱因,但绝对还称不上是决定性因素,把这种恶劣事件发生的原因都推到女性身上,是不公平的。

事实上绝大部分女性的着装都还算得体,主动选择穿成“内衣清晰可见”的极少。即便是穿着过于清凉,地铁运营公司也没有权利和资格对其作出道德评判。相反,对

于这样的性骚扰“高危人群”,地铁方面更应主动提醒、积极预防,保护乘客的安全。至于对暴露着装的批评,自有社会评价、路人眼光等来负责,地铁的手不能也没必要伸那么长。

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不仅仅上海一地有,也不仅仅中国有。这种事在我们的近邻印度、日本都屡见不鲜。日本地铁甚至专门推出了女性专用车厢来物理隔离那些“痴汉”。那么中国地铁该怎么做呢?至少,可以在地铁里用视频、宣传画、小册子等形式告诉女性乘客:第一,性骚扰是恶行,对待恶行就要坚决抗争而非忍气

吞声;第二,车厢、车站内哪些地方是性骚扰容易发生的场所,都容易在哪些时段、通过什么手段实行;第三,性骚扰都有哪些形式,除了咸猪手、偷拍、不良用语还有什么;第四,采取怎样的自我保护来对付性骚扰,当然这里面可以附带提醒一下着装。最重要的是,地铁运营方自己要多安排保卫人员,开通有人值守的投诉电话,让性骚扰者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说白了,这场“反性骚扰的人民战争”要地铁运营公司、警方和全体乘客一起来打,要有实际行动。光发发微博,挤对女同胞,甚至推卸责任,就算是好心也只能办成坏事了。